

中国政治通史

动荡与变迁
的
宋辽金政治



●
李 江
晓 晓
涛
著

泰山出版社

中国政治通史

齐 涛 主编

动荡与变迁
的
宋辽金政治



6

李 江
晓 晓
著 涛

泰山出版社



目 录

一	序说宋辽金时代	(1)
二	北宋王朝的兴起与立国规制	(5)
	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政局	(5)
	宋太祖赵匡胤	(18)
	王朝的建立和巩固	(23)
	现实主义的统一战略	(31)
	“斧声烛影”与“金匱之盟”	(39)
	祖宗家法	(65)
三	真宗时期内外政策的调整	(95)
	契丹述略	(95)
	宋辽和战与澶渊之盟	(105)
	西北形势的变化和对党项政策的调整	(112)
	“守内虚外”与循默之风	(124)
	真宗崇道与天书封禅	(134)

四	士大夫的崛起与仁宗朝的政治革新	(144)
	仁宗继位与刘后听政	(144)
	因循之弊	(154)
	西北局势的恶化	(162)
	民变与兵变	(172)
	士大夫的崛起与朋党之议	(181)
	庆历新政的流产	(193)
五	熙宁、元丰年间的变法	(208)
	王朝的积贫积弱	(208)
	宋神宗与王安石	(219)
	王安石的新政	(233)
六	从“更化”到“绍述”	(239)
	高太后听政与旧党上台	(240)
	“以母改子”的元祐更化	(246)
	旧党的分野	(255)
	祖孙二人的心事	(267)
	“绍述”的风暴	(275)
	党争的恶果	(285)
	废后风波与绍圣诸臣的明争暗斗	(290)
七	宋徽宗集团的腐朽统治	(301)
	调和的破产	(302)
	“绍述”的本质	(312)
	君臣狼狈为奸	(319)
	众“贼”的嘴脸	(336)
八	金朝崛起与辽、北宋的相继灭亡	(356)
	金朝崛起与联金灭辽的闹剧	(356)
	靖康之难	(368)
九	南宋的建立与偏安政局的形成	(389)
	宋室的南迁	(390)
	南宋的战和不定与金朝政局的变化	(413)

“绍兴和议”与岳飞冤案	(440)
十 秦桧专权	(465)
秦桧的专权之术	(465)
“伴食”众生相	(472)
钳制舆论	(478)
迫害异己	(482)
恶贯满盈	(490)
十一 后秦桧时代的宋高宗统治与完颜亮南侵	(498)
“一桧虽死，百桧尚存”	(498)
皇储之立与完颜亮南侵	(504)
十二 孝宗、光宗两朝的政局	(515)
符离之败与“隆兴和议”	(515)
虚多实少的对金政策	(525)
皇权独尊	(533)
佞幸政治	(540)
继承人的苦恼	(551)
绍熙政变	(557)
十三 韩侂胄、史弥远的相继专权	(567)
韩侂胄专权	(567)
开禧北伐与“嘉定和议”	(581)
史弥远专权与理宗之立	(592)
十四 南宋的灭亡	(604)
有名无实的“端平更化”	(604)
联蒙灭金与宋蒙战争的开端	(611)
孟珙、余玠之死	(616)
“阎马丁当，国势将亡”	(621)
贾似道专权	(625)
南宋灭亡	(638)

序说宋辽金时代

宋辽金时代起自 960 年北宋王朝建立，讫于 1279 年南宋灭亡，历时三百二十年。这一历史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分裂与对峙的时代。当北宋开国君主赵匡胤建立北宋王朝，终结五代十国的分崩离析之际，其实际拥有的地域只是中原与南方，较之隋唐已大为局蹙，真正的统一大业并未完成。在其北部，有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其西北则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此外，云南的大理、西藏的吐蕃、新疆的高昌、龟兹、于阗等也是独立性颇强的地方政权。

自北宋王朝建立，便面临着辽王朝的强兵压境，宋太宗北伐不成，放弃了收复燕云失地的计划，辽兵则步步南下，以至真宗时代有了澶渊之盟，北宋每年向辽朝纳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称“岁币”。西北地区的党项族在唐末就任其酋长拓跋思恭带领下参与镇压黄巢起义军，拓跋

氏被赐姓李，封夏国公，拥有了夏、银、绥、宥、静五州。北宋建立后，党项人与宋时战时和，势力不断壮大，至元昊为首领，已拥有了东据黄河，西奄河西的广阔地区。元昊于1038年称帝，建国号为夏，史称西夏，宋夏之间战争不断。六年后，宋夏订立和约，北宋每年向西夏纳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西夏则去帝号，奉宋正朔。

公元十二世纪初，居于白山黑水间的女真人势力渐强，1113年，完颜阿骨打继任女真各部首领后，率众反辽，1115年，阿骨打称帝，建国号“大金”。大金建国后，势力迅速南下，屡败辽兵，北宋遂与金订立海上之盟，相约夹攻辽朝。此后，金兵势如破竹，直取燕京，宋兵则出师不利，接下来的北宋历史又成为宋金对峙。金兵破辽不久，便屡屡南下，至1126年攻下开封，掠徽宗、钦宗北去，北宋亡。次年，赵构在南京称帝，建南宋。南宋与金的对峙旷日持久，经历了岳飞抗金、绍兴和议、隆兴和议、开禧北伐与嘉定和议。战和之中，金与南宋都走向衰落。

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建大蒙古国，先灭西夏，又与南宋夹击金朝，灭金后，又攻下大理，1276年攻下南宋首都临安，三年后，南宋末帝赵昀兵败投海，南宋亡，宋辽金时代也告一段落。

北宋实现了中原与南方地区的统一后，为强化中央集权与专制统治，在全国设十五路，每路设转运司、提点刑狱司、安抚司、提举常平司，分掌一路之政，路下设州（府、军、监）、县，路、州、县的官员都由中央官兼任。在中央政府则分割宰相权力，宰相之下设“参知政事”为副相，又以枢密使与三司使分取宰相之军权、财权，禁军也不再设最高统帅，将帅士兵之间则相互分割，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这些做法固然起到了加强中央集权与

巩固皇权的作用，但其负面影响也同样突出，机构臃肿，效能低下在所难免，但冗兵、冗官、冗费与积贫积弱成为其两大顽症，仁宗年间有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神宗年间又有更大规模的王安石变法，虽然他们都想革新政治，富国强兵，却都归于失败。此后的北宋社会政治平庸以至昏暗，无可述焉。北宋都开封，历九帝，共一百六十八年。南宋王朝虽有岳飞、辛弃疾、文天祥等中流人物支撑危局，但自帝王至秉政者都印有深深的偏安烙印，不肯清理政治，卧薪尝胆，又无恢复故国，一统天下之志，与北方的战和之际，每况愈下，终至衰亡。南宋先都南京，又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历七世九帝，一百五十三年。

惟两宋之经济文化，多可称述。经济重心的南移与农业手工业、商业的迅速发展，使两宋经济成为中国古代经济史上最为繁盛的时代之一。从粮食产量、品种，到农业生产技术，从纺织业、造船业、制瓷业到城市商业的发达，从印刷术、指南针到火药、火器的制造；从沈括的《梦溪笔谈》到李诫的《营造法式》，等等，足以使两宋王朝的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世界。与之相应，两宋的思想文化也获得空前的繁荣，宋学的形成与理学的崛起使之成为东方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程朱理学，对宋代及宋以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可替代的深远影响。《资治通鉴》、《通志》与《宋会要辑稿》、《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大型典籍的完成，则昭示了宋代史学的历史地位。当然，宋词、宋诗，话本小说、戏曲、绘画等等，同样使这一时代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群芳竞妍、人物辈出的时代。

繁荣的经济、文化，精致而强化的中央集权与积贫积弱的政局融为一体，使两宋成为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转折点。

辽朝的统治带有浓厚的奴隶制残余，在其统治区内全面实行胡汉分治政策，从中央到地方的北面、南面双轨官

制是其政治制度的最大特色，北面官以契丹贵族担任，行辽朝旧制，拥有实际权力；南面官多以汉人担任，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另外，还有“头下军州”与“四时捺钵”之制。辽初都西楼（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后迁都中都（今内蒙古宁城），共历九帝二百一十年。

西夏的政治制度多仿宋制，中央设中书省、枢密院、三司与御史台，其兵制为部落兵制。在与辽、北宋、金的对峙中，它注重吸收先进的经济与文化，促进了西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西夏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历十帝，一百八十九年。

金朝灭辽后，势力迅速南扩，占有了淮河以北的广阔土地。金与西夏、南宋长期对峙，战事频发，但其制度多仿宋与西夏，设尚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开科取士，并制定了《皇统制》，其女真旧制的遗存则体现在“猛安谋克”制的实行上。金朝拥有黄河流域后，其经济与社会得到较快进步，在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宗教等方面也取得一定成就。金朝先都会宁（今黑龙江省阿城县南），后移至中都（今北京），历十帝，一百二十年。

宋辽金时代的历史格局就是如此，不断兴起的北方政权的南下与富庶繁华的中原王朝的抗争成为时代的主线，元王朝的兴起与南宋的灭亡是这一线索的延伸与扩展，明之亡元与清之南下则只与这一历史线索的余绪有关，内容与影响已大不相同。

北宋王朝的兴起与立国规制

北宋王朝的基础是唐末以来的分裂与割据，其立国的过程既是统一的过程，又是内部集权与专制的强化过程。由于时代的原因，它比其他新兴的王朝面临着更多的内忧与外患，种种的因缘际会，使其王朝初建即打上了特色鲜明的时代印记。

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政局

当九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唐王朝事实上已经名存实亡了。

898年阴历八月，唐昭宗在经历了三年多的颠沛流亡之后重新回到长安，同时宣布改元“光化”，以资庆贺。然而，久已存在于朝官和宦官之间的矛盾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趋白热化了。南北司各结藩镇为援，互相倾轧。唐

昭宗贬斥崔胤不成，却与崔胤策划清除朝廷的宦官，这便招致了宦官们的怨恨和恐慌。900年阴历十一月，宦官刘季述等合谋废黜唐昭宗，将其囚禁于宫中，并对政敌实施野蛮的报复。宰相崔胤因为得到朱温的支持，所以才幸免于难。

当时朱温以汴梁(今开封)为中心，控制着关东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是各藩镇中最强大的一镇，对时局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因而当刘季述等发动政变后，也派人前来通款，表示愿意送上唐家社稷。朱温召集僚属商议，决定采纳李振的建议，恢复唐昭宗的帝位，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朱温的支持下，崔胤于901年正月联合侍卫军将领孙德昭等人诛杀刘季述等宦官，迎唐昭宗复位。为了感激朱温的功劳，唐昭宗进封他为梁王。

此后，朱温趁机向关中拓展势力。到903年，他的军队已经控制了关中的大部分地区，并直接控制了朝廷和京师。同年正月，朱温大举灭阉，把长安城里剩下的五百多名宦官统统赶到内侍省杀掉了。这时，朱温欲取唐室而代之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904年，朱温杀了宰相崔胤，并强迫唐昭宗迁往东都洛阳，一路上又杀死了昭宗的所有亲信侍从。同年阴历八月，昭宗在洛阳被谋杀，他的第九个儿子、十二岁的李祝嗣位(即昭宣帝，又称哀帝)。907年，朱温废黜了唐昭宣帝，用禅让的形式即皇帝位，改国号为“梁”，最终宣告了唐朝的灭亡。

唐亡以后，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前后历时五十四年，史称“五代”时期。在江淮以南，与梁同时并存的有吴、吴越、前蜀、南汉、楚、闽、南平(荆南)七国；后晋时前蜀已灭、后蜀代兴，同时吴为南唐所代；后周时又有在太原立国的北汉。前后共有十个小国，史称“十国”。

五代十国时期的政权分立，是唐中后期以来藩镇割据

局面的继续。实际上，五代不过是五个自诩正统的地区性政权，其势力范围始终没有逾出黄河流域。唐朝的二百六十八个州，五代所谓中央政府控制的不及半数。十国则是五代统御所不及的独立王国，为一般草莽英雄割土据地的产物。十国之内，除北汉偏于山西一隅之外，其他九国东起淮南、闽、浙，南达两广，西至四川，其区域面积绝不亚于中原朝廷。

当朱温在中原地区迅速崛起的时候，惟一能与之抗衡的是沙陀族军事首领李克用。他的父亲朱邪赤心因勤王有功而被唐朝赐以国姓。在收复长安的军事行动中，李克用的功劳不在朱温之下。此后他以晋王的身份，取得太原以北的地区（河东）作为沙陀骑兵的根据地。五代十国时期，这种由太原与开封之间造成的对抗形势从未中断过。即便是昔日的战友，如今分处两地，成为世仇。继朱梁之后由李克用之子李存勖建立的后唐和石敬瑭的后晋、刘知远的后汉、郭威的后周，其创始人先后出自沙陀李氏的军事系统，尽管他们和他们的继承人在血缘上分属若干不同的种族。

从笼统的时间段来说，五代时期占据了十世纪的前半期。在悠久的历史里，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不算过长。对于这一时期的史事，传统史家历来罕有褒词，不是讥之以“僭窃交兴，称号纷杂”，就是斥之为“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的黑暗年代。然而，如果我们不是囿于单纯的道德评判，而是以长时段历史联系与发展的观点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在攻伐杀掠、篡窃成风的表象下面，这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社会也正经历着若干积极的变化，这些积极的变化正在为中国历史发展新阶段的到来开辟着道路。

五代十国的产生，缘于唐朝的衰亡。但是李唐王朝的崩溃，并非由于社会的退化，而是由于社会的进化。

进入八世纪以后，唐帝国境内的人文因素愈趋繁复，各地区的发展水平却又参差不齐，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使得唐初的制度设计与实际变化的情况之间发生了越来越大的距离，各项制度和组织的调整，势所难免。

唐承隋制，实行“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陆贽语）。这种赋役制度所规定的每丁负担数是以天下每一丁男都受田一百亩的假设为依据的。事实上，唐开国时，丁男受田多少就很不一致。例如，关东地区有大量荒地，农民受田之数可达百亩，而关中之民只能受田三十亩乃至更少，因而一开始就有逃往宽乡的趋势。后来土地兼并愈来愈烈，官府课役愈来愈重，致使民户失地逃亡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武则天末年，韦嗣立上书说，自高宗永淳（682年）以来二十余年，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租课减耗，国用不足。“亡逃过半”虽未免夸张，但逃亡现象不限于关中等地则是事实。《新唐书·食货志》说：玄宗开元以后（当指天宝年间），天下户籍久不改造，丁口转死，田亩买卖，贫富变化，都不再调查。这意味着唐初的均田制度已不复存在，调查丁口并无实际意义。安史之乱以后，户口耗减，租庸调法更难以施行。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朝廷采纳杨炎的建议，正式改租庸调法为两税法，民户不分主客、不分丁男中男，都按贫富等级收取赋税。然而，制度的规定与制度的实际施行之间又存在着巨大差异。两税法中“量出制入”的原则实际上为各地区自行斟酌处理其财政税收开了方便之门。一到内忧外患加剧，其分化的情势也更明显，朝廷的措施殊难有公平合理可言。各藩镇内的节度使既然对于“长史属官任情补署”，则其经理税收，已无一定的法则，具体表现为：田赋普遍提高；正税以外，加税剧增；除农业税外，其他各项专税（如地产、盐矾、茶酒、转口税等等）也成为广辟财源的手段。

唐朝节度使和副使各有判官之外，各道另设“军事判官”，各牙军也有“押牙”，掌管经营与后勤。这些人员利用军事组织，逐渐形成独立的财政税收系统。五代时承袭这种体制，将税收增加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由于藩镇官员一般世袭，他们跟所割据的地方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并且对本地情况比较了解，又有完整的自主权，所以在征敛时尽量避免发生严重的社会问题。这种体制，较之以往官僚制度一切由中央遥控、只顾系统的完整而漠视各地实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当唐末藩镇跋扈的时候，各节度使割地自守，且在自己管辖的城市里创设牙军。牙军原系“衙内之军”，不过是节度使的随身卫队，但是一经各节镇扩充和加强，即成为割据者直接控制的亲军。牙军装备精良，且有特殊的餉项给养，内中将校又多成为节度使的“假子”和“养子”，不仅职位世袭，而且一旦队伍扩充，他们就升任高级指挥官。其他的“外军”或“团练”则作为第二线、第三线的后备力量，藩镇的军事势力也由所在的军镇而辐射到全道。这股势力即使不能完全代替州县地方的官僚组织，至少也构成了一种平行的机构，干预或独断民政。

五代一方面继承了这种军事、财政和行政高度一体化的体制，另一方面也在逐渐加强中央的管制。例如，枢密使的设置，即体现了中央集权的趋向。枢密使原为小官，设置于唐朝以宦官典禁军的时代。五代时枢密使改由士人担任，成为与皇帝关系紧密并且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军政长官，不受宰相的统御。另一个事例就是三司使的设置。“三司”为盐铁、度支和户部。盐铁掌管新型商业收入，户部掌管传统的农业收入，度支则管辖交通和物品转运，把这些职责并归于一个机构掌握，也表现着中央政府财政的集中，并带有策应政府军事行动的意味。此外，后唐曾于926年设置“三川搜访图籍使”，后周也于958年派三

十四人到各州检定民租，这都表明各地区各自为政的局面渐趋结束。

从政治上来看，五代十国虽仍是藩镇专权的时代，但割据的状态趋于稳定，割据的势力趋于弱化，统一的倾向显露端倪。这与唐朝末年的大混乱相比，无疑是一种进步，同时也是这一时期中国政局中最值得注意的变化。

五代的嬗替，使中原地区的强藩大镇由割据力量转化为统一的力量。883年，当朱温被唐朝任命为宣武军节度使时，他只不过是诸多割据者中间的一个，宣武镇也并非强镇。凭着勇于作战又长于谋略，朱温逐渐由弱小变强大。到905年，朱温已经拥有二十一个镇。其中除天雄（即魏博镇）、武顺（即成德镇）是附属镇，武定是前蜀王建的属地，其余各镇割据者均被朱温消灭。在此基础上，朱温最终得以取代唐朝而建立后梁。继李克用而为晋王的李存勖在与后梁争夺统治权的过程中，消灭了中唐以来长期割据河北的三个藩镇，并于同光元年（923年）灭梁，建立了后唐，将唐、梁合并为一个国家，此后又进一步统一了黄河流域。此外，后晋太祖石敬瑭、后汉高祖刘知远、后周太祖郭威，也都或由强藩、或由操纵着禁军大权而取得帝位。为了不使自己重蹈前朝的覆辙，这些人都能自觉地加强中央的权力，限制和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在这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积累了不少经验。

五代各朝削平藩镇的总策略可概括为“强本弱末”。

所谓“强本”，就是加强中央禁军的力量，作为推行削藩政策的后盾。后梁建国之初，禁军有左右龙虎、左右羽林、左右神武、左右龙骧、左右天兴、左右广胜诸军；又另置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由朱温自将，作为自己的私兵。后唐的禁军设置沿袭唐朝制度，有六军和诸卫。明宗又设侍卫亲军，开始建立新的禁军体系。到后晋时期，开始以侍卫亲军作为全体禁军的编制形式。这种做法被后

汉、后周所继承。到周世宗时，又组建殿前军。从此，殿前、侍卫两司构成了中央禁军乃至全部武装力量的核心，六军和诸卫则已名存实亡。与唐朝中后期相比，五代各朝都很注意加强中央禁卫军，使之成为捍卫中央的支柱，从根本上改变了内轻外重的局面。其时也有不少藩镇图谋叛乱，如后唐时定州的王都，后晋时魏博的范延光、镇州的安重荣、襄州的安从进、青州的杨光远，后汉时魏博的杜重威、河中的李守贞，但他们的行动均以失败而告终，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朝廷有一支强大的禁卫军。

所谓“弱末”，就是削弱各地藩镇的力量，逐渐剥夺其赖以存在的条件。首先是建立军队的屯戍制度。五代时期的屯戍，大体可分几种类型：或以禁军进驻地方，或遣藩镇之兵屯戍外镇，或以禁军与藩镇兵同驻一地，或以一军分屯数地。其用意均在于牵制和削弱藩镇的力量，使其行动不得不有所顾忌。其次是从各道选募骁勇精壮之士以补充禁军。有的是在藩镇兵中招募，有的是在民间招募。第三是移易藩帅。五代时期的藩镇节度使均出自朝廷任命，而且移易十分频繁，在镇时间长则四五年，短则几个月，通常为一两年，而且经常是带着军职担任政事、随从征伐，并不亲莅本镇。唐代那种节度使专由父子世袭的现象已属罕见。第四是分割藩镇辖区，将一个藩镇分为两个或数个，并建立“支郡”直属京师的制度，使原先的藩镇属州直接归中央管辖。第五是命令各镇拆毁城防、撤消武备。如后唐同光二年（924年），潞州小校杨立据城反叛，庄宗“诏天下收拆防城之具，不得修浚池隍”，以此来铲除地方割据的隐患。第六是对藩镇荐举人才、辟除僚属以及州县行政等方面作了若干限制，规定州刺史可以直接向朝廷奏事。这样，既可防范藩镇利用举荐官员、辟除僚属来结党营私，又逐渐改变了唐中后期以来藩镇专擅州县行政的局面，提高了中央在地方的权威。通过上述各种措

施，五代的藩镇，至后周时，除夏州以外，在不同程度上都被朝廷控制乃至消灭。

五代的削藩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绝对君权制逐渐酝酿的过程。宋代赖以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各种措施，就是吸收了五代的许多削藩经验而来的。

藩镇将帅作为嗜利性极强的军阀，受其贪欲的驱使，往往发展到公开劫夺的地步。史书上说：“五代之乱，朝廷威令不行。藩帅劫财之风，甚于盗贼；强夺枉杀，无复人理。”军阀及其手下对一般人民和商旅的劫掠和危害，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更有甚者，五代时牙兵跋扈，承中唐以来擅自废立藩帅之风，往往害一帅、废一帅，如同儿戏。发展到后来，竟至于利用兵变而拥立皇帝。终五代之世，军士拥立皇帝之事，时有发生，以至人们“视丧君亡国亦未尝以屑意”。在这种劫杀成风、易帝如同儿戏的状态下，不但普通民众苦难深重，就连那些身居高位的藩镇将帅也常有朝不保夕之感。人心思治，迫切盼望有一个统一安定的政治环境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

与此同时，南方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也为国家的重新统一创造了条件。

南方自南朝历经隋、唐，经济一直呈上升的态势，并且形成了若干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以后，通济渠成为南北水路交通的总干线，形成了以扬州为中心的水陆交通网络。自扬、益、湘南以至交、广、闽中等州，所有公家漕运、私行商旅都依靠通济渠，唐朝廷的主要收入也来自江、淮地区。唐朝建都关中，漕运有三门砥柱的险阻，从洛阳运米到长安，漕船在三门峡多有覆没，一斛能送到八斗，就算是最好的成绩。如果改走陆路，运送两斛的粮食要花费一千文左右。民间苦于漕运，因而有“斗钱运斗米”的谣谚。唐高宗以后，朝廷每